

世界历史学术书系

民族再生的期望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民教育

◎ 刘大明 著

MINZU ZAISHENG DE QIWANG

54

出版社

世界历史学术书系

民族再生的期望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民教育

MINZU ZAISHENG DE QIWANG

◎ 刘大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再生”的期望: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民教育/
刘大明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7
(世界历史学术书系)

ISBN 7 - 5004 - 4932 - 1

I. 民… II. 刘… III. 公民教育—研究—法
国—1789~1814 IV. D756. 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1723 号

责任编辑 郭沂纹
责任校对 郭娟
封面设计 王华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邮购)

010—64031534(总编室)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订 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625

插页 2

字数 280 千字

定价 2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应该是实行现代民主政治的国家。在这样的民主国家里，人人都应该被称作“公民”。

“公民”不同于非民主国家的“臣民”。两者有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也有着不同的德行。此外两者还有一点重大不同，即“臣民”可以依托传统的强大力量自然而然地生成，而“公民”就不行：作为一种现代人，它的成长不仅没有传统的资源可供依托，相反却会处处受传统势力的阻遏。因此，“公民”的生成需要多得多的人为努力，需要加以悉心的培养。

然而，公民的培养还特别重要：因为没有公民，就没有民主政治，而没有民主政治，也就没有现代国家，你这个民族或国家就要停留在前现代社会里，你的现代化愿望就只会化作一团幻梦，你就要落后，就要挨打，最后还可能被开除“球籍”。

所以一切现代国家，尤其是一切正努力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家，都十分重视公民教育。而且对于那些尚未完成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它们推进公民教育的努力，免不了都要先经过一个向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学习的过程，因为后者先走了一步，有经验。

这就引出了研究现代公民教育史的必要性问题。应当说，关于现代公民教育史的研究，在我国学术界以往很长的一段时期里

2 “民族再生”的期望：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民教育

基本上是被忽略了。直到前不久，随着全民关注“政治文明”建设的风气的兴起，这个问题才开始引起学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时代前进的步伐有点慢，但终于还是在进步。

刘大明这部和现代公民教育史有关的书，就是在这个时代氛围中问世的，它从而也就构成了这种时代进步的一项切实的证据。

当然，刘著并不是一部现代公民教育通史——这样的通史，如果不是那种剪剪贴贴的赝品，缺乏足够相关研究的中国史学界目前估计还写不出来。刘著写的只是大革命时代法国的公民教育。这个题域看上去很窄小，实则非常关键：因为整个现代公民教育史，就是从这里发端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短短十来年的公民教育实践，已经涉及了这一伟大事业可能包含的几乎全部问题，而法国革命者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做出的无数政治文化创造，无论成败，都是人类文化的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而且事实上都对后世产生过显著的影响。

所以，刘大明能选择这一课题来做文章，说明他的时代敏感和史识水平都还是不错的。再看看文章的具体架构和使用的文献资料，我想人们对于他的史学功底和治史态度，恐怕也应能作出相当积极的评价。尽管没有能够去法国查找资料，但凭借北大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和自己熟练的法语阅读能力，以及一套非凡的网上搜寻工夫，他还是较好地完成了论文的资料准备，并在此基础上出色地勾勒出了一幅大革命时代法国公民教育活动的历史画卷。

这幅画卷，虽然线条还相当粗糙，但对于正在起步的我国现代公民教育史的研究，仍不失为一份有用的参考资料。

刘大明的劳动是艰辛的，也是卓有成效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作品中也留下了一些遗憾，主要是作者在写作时英语水平尚有

限，没有能够参考英语世界的许多影响重大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在理论修养方面也有所欠缺，没有充分注意吸取学界各种新思潮中的合理成分来强化自己的阐释能力。这些缺憾，希望作者尽快克服，以期深化本课题的研究，为推进中国公民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高 毅

2005 年 4 月 12 日

引 言

近些年以来，有关“公民教育”、“公民意识”培养的课题研究在我国学术界日趋活跃，教育学、政治学和法学界的学者们都为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相比较而言，历史学对这一课题的探讨就显得落后了，很少有学者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这个领域。“公民”的身份定位属于法学的研究领域，“公民教育”则属于政治学和教育学的范畴。但是，它们也同样是历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人们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地形成了这些概念，继而从概念发展为理论，并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的。对于公民教育这条最终汇集成全球现代民主政治江河的源泉，人们难道可以不需要借助历史学的研究去探求它的源头吗？

那么，现代公民教育的源头到底在哪里？

在现代西方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政治”是一个令民众广泛厌倦的概念，这一点可以从无数的政治讽刺笑话中得到证明。但是，一切事物仿佛都有例外，对“政治”概念的认同也是如此。打开政治学词典，人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在世界近代史上，有一个民族似乎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人们所熟知的政治学术语如“公民”、“反革命”、“左派”、“右派”、“白色恐怖”、“乱党”、“政治公开性”等大多来源于这同一个民族。这就自然而然地使人对这个民族与政治的这种不解之缘产生深刻的印象和浓厚的兴趣。

这个民族就是法兰西。

然而，法兰西具有“政治民族”特征的历史并不悠久——只是18世纪以后的事情。18世纪以前的社会里，法兰西民族并没有表现出对政治有什么特殊癖好的痕迹。在那个时代，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的可能性和基本条件都不具备：一方面，整个社会由国王和僧侣、贵族两大特权等级统治，不仅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完全被排斥在政治生活领域之外，作为旧制度^①统治支柱之一的贵族个体，大部分也被王权剥夺了对社会的治理权。另一方面，向社会成员传授知识的渠道——教育，几乎完全掌握在天主教会的手中。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国王的臣民和教会的臣民，教育的内容与社会现实生活相去甚远，它要求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服从、忍耐，而将希望寄托于来世；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必备条件——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都极为低下。不仅民众被政治生活所抛弃，议论政治也被视为一种精神的奢侈；以致对一些有政治抱负的人来说，参与政治只能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政治只是极少数社会上层人物涉足的领域。即使有几声关于宗教平等的政治呐喊在回荡，有几篇关于国家主权学说的政治论文得以问世，也多出自于新教徒或法学家的笔下；整个民族都生活在君主权至上、死气沉沉的政治环境之中。

历史上这样的一个法兰西，为什么会在几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就培养出社会成员如此强烈的参与政治的意识，在他们的政治生活中创造出如此形象、如此众多又具有如此影响力的政治学术语，进而使他们的民族自身也具有了“政治”的特征？是通过什么途径，使旧制度下完全被排斥在政治事务之外的、与政

^① 旧制度指17世纪路易十四统治到18世纪末大革命前夕法国的绝对君主制的社会制度，几乎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治生活无缘的民众普遍地关心政治，继而又积极地投入到政治生活之中，并且使他们的后代继续保持着如此浓厚的政治热情？何种手段竟有如此巨大的社会历史作用和感召力？细检之下，我们会发现，大革命时期的公民教育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18 世纪对于法国来说是一个进步的世纪和“政治学的世纪”。在自身的经济发展的惯性作用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下，法国的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对法国的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法国的教育拓展了新的范围，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来自于英国的更重要的影响是在社会政治文化领域，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学说通过孟德斯鸠（Montesquieu）、伏尔泰（Voltaire）和百科全书派的介绍和传播，在法国的文化界产生了广泛的、强烈的反响，并激发启蒙思想家们在科学化或理性化世界观的指导下，从各个侧面对法国的社会现状和弊端进行思考和批判，并促使他们以纯世俗的观点试图在人类事务中发现一些类似于自然规律的“永恒法则”。启蒙思想家们关于社会、政治、教育等方面的学说，尤其是要求将君主和教会的臣民改造成新社会的公民的教育理论，对法国社会的转型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并为未来大革命的公民教育提供了理论的先导。启蒙运动的兴起，预示着法国的社会将面临一场政治和文化教育从形式到内容的深刻变革。

人们都熟知马克思的名言：法国大革命是以资产阶级为首的第三等级对封建旧制度在各个领域中展开的一场大搏斗，“是第一次完全抛开了宗教外衣，并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①的革命。法国大革命也是一场激进的革命，人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0页。

4 “民族再生”的期望：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民教育

的政治积极性，彻底扫荡了封建专制制度，弘扬了自由、平等、民主的观念。那么，法国革命为什么会如此激进？为什么要在已经被称为“公民”的法国国民中，再明确地划分出“敌、我、友”？

1789年大革命爆发后，其进程的迅猛超出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重大事件。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整个法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是，革命后建立的新制度是否能在短期内就得以巩固？尤其是在旧制度下深受社会传统习俗影响的民众，尽管他们的社会身份可以在法律上一下子从“臣民”转变为“公民”？他们在生活中能理解新身份的内涵，履行新身份应该享有的权利和应该担负的义务吗？

法国大革命的进程显示出它在各方面与旧制度的决裂，“民族再生”就是这种决裂信念的具体表现。社会再造的成败关键在于“民族再生”，而“民族再生”又不可能自然而然的实现，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才能成功。因此，“民族再生”就变成了一个对人的教育的问题。只有通过教育，将旧制度下的被动的“臣民”改造成新制度中的主动的“公民”，新的社会大厦才能建立牢固的基础。正如革命家比约-瓦雷恩（Billaud-Varenne）所说：“公共教育是培养公民责任感的武器。”^① 公民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如此之巨大，以至于革命党人对公民教育寄予了无限的希望，公民教育的问题第一次被列入国家事务的主要内容而提上议事日程，由历届议会反复讨论。公民教育构成了大革命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革命时期，先后执政的各个派别都特别强调对公民的教

^① 雅尼克·波斯克、苏菲·瓦尼克：《革命之声》（Yannick Bosc et Sophie Wah-nich, *Les voix de la Révolution*），巴黎，法兰西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09页。

育。但是，公民教育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既没有现成的榜样可以模仿，也没有历史的经验可以借鉴。新制度所要求的新公民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或者说新公民的基本素质是什么？怎样对公民进行教育？大革命不同时期对这些问题的见解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这些差异除了受到当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外，还与大革命前启蒙思想家们对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看法不同，以致在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方面也存在重大的差异有着很大的关系。这种教育思想和理论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大革命的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

从整体来看，大革命公民教育的内涵是全方位的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包括公民道德的教育、公民文化科学知识的教育和公民实用职业技术的教育等三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在大革命实践中，公民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在革命的前后两个阶段却表现出明显的特点和侧重。以热月政变为界，革命的前期是公民的“道德”教育居于主导地位的时期。革命党人注重的是全体社会成员与旧制度的决裂和对新政权、新制度的认同，以及共和主义“道德”的培养。他们运用各种方式、甚至是暴力和恐怖的手段，以期造就公民的“美德”。他们将法兰西全体国民毫无例外地都作为接受教育的对象；将一切与政治有关的事物和现象都与“道德”联系起来，作为人的灵魂改造的内容而纳入了公民教育的领域。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活动的实践，大革命的公民道德教育在法兰西民族中播下了日后“政治民族”的种子。在这里，公民教育与革命本身的相互关系变得模糊了，以至于我们很难分辨出已经被混淆了的目的与手段、原因与结果。这种重视“道德”式的公民教育的特点贯穿大革命的始终，即使到了雅各宾派倒台后的“热月反动”以及以后的督政府时期，革命家们对“道德”教育的热情仍然有增无减。《共和三年宪法》在增加了“公民义务”

的条文的同时，还在最后一条中写道：“法兰西人民把本宪法寄托于立法院、督政府、行政官和法官们的忠诚，寄托于家长们、夫妇们和母亲们的警惕，寄托于青年公民的情感，寄托于所有法国人的勇敢无畏。”^①道德救国，法国革命家对此抱有多么深厚的期望！

在公民的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和实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在革命的前一阶段，鉴于革命的形势和旧的教育机构被砸碎、教育改革计划无力得到实施的特殊环境，公民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和实用职业技术教育深深地受到了“道德教化”的冲击和影响，陷入了步履维艰的萧条状态之中。热月政变后，百科全书派教育理论的继承者们逐步认识到，“共和主义”的新公民所应具备的公民素质不仅仅是“道德”；而且目不识丁的人占据国民大多数的状况，也必然会极大地阻碍“道德”教育的推进。在经济和财政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们在强调公民意识和道德教育，并以各种手段孜孜不倦地进行灌输的同时，将酝酿已久的大革命学校教育改革方案付诸实践，使受到启蒙思想启发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培养公民综合素养的文化科学知识教育真正地开始起步。

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开始，公民教育的观念和实践至今已经问世二百多年，它对西方文明的进程，即社会的政治民主化、经济的工业化和决策思维的科学化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公民教育的这个对于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意义的概念和教育的活动，在我国一直被视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物，以致其积极的社会意义从来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公民教育史的研究在我国几乎是一片空白。随着

^① 雅克·戈德肖：《1789年以来的法国宪法》（Jacques Godechot, *Les co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depuis 1789*），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79年版，第141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政治和教育的发展,这种片面的认识已经得到了克服,公民教育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已经获得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认同。在我国全面推行社会主义的公民教育,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已是大势之所趋。那么,探究各国在进行公民教育过程中的,尤其是探究公民教育的发源地法国的公民教育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对于我国公民教育的实施和发展将不无裨益。因此,无论是对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的深入研究而言,或是对大革命自身进程的深入研究而言,还是对近代法国社会发展和西欧文明进程的研究而言,以及拓宽对公民的概念和公民教育起源的认识而言,乃至对当今我国正在推行的公民教育的需要而言,大革命时期公民教育的课题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外学者在法国大革命公民教育课题的研究方面,由于资料的缺乏,目前尚不能了解到它的全貌。法国学者的研究,在汗牛充栋的法国大革命史著作以及最新的期刊论文中,虽或多或少地研究或涉及了大革命时期法国的教育,但基本上都是把其作为大革命进程中的一项政治活动,而没有从大革命为实现“民族再生”的神圣使命和培养新型公民的角度来考察这一政治文化活动。20世纪50年代以来,法国先后出版的安托瓦内·雷翁(Antoine Léon):《职业定位的儿童心理教育学》(1957年)、《技术教育史》(1961年)、《普遍培养和职业学徒》(1965年)、《法国教育史》(1967年)、《法国革命与技术教育》(1968年);M. 贡塔尔(Maurice Gontaed)的《法国的初等教育,从大革命到基佐(1789—1833)》(1959年);舍瓦利埃(Chevalier)、格罗佩兰(Groperrin)、马耶(Maillet)合著的《大革命迄今的法国教育》(1968年);C. 勒利埃弗尔(C. Lelievre)的《学校制度史1789—1799》(1990年);J. 米诺(Jacques Minot)的《法

国大学史》（1991年）等关于大革命时期法国教育的著作，以及《法国大革命历史年鉴》期刊上刊载的大量论文，这些著作和论文虽从各个侧面研究了大革命时期的教育，但总体上都属于教育史或文化史的范畴。

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历来是我国史学前辈和同仁辛勤耕耘的重要领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除了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分期问题、人物评价、重大事件的性质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展开讨论的大革命史学的“拨乱反正”外，还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社会、经济、文化、心态、风俗、民情等方面，对法国大革命展开了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相继出版和发表了大量有关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并特别重视翻译出版许多国外法国史研究名家的代表作，引进和介绍国外各种史学流派的观点、内容和方法，消化吸收国外的优秀成果，法国大革命才逐渐向中国人展示出它的面貌。其中，我的导师高毅先生的《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从人们所熟知的大革命政治现象中挖掘出往往被人忽略的文化底蕴，从大革命的政治活动中提炼出政治文化的深层次内涵，填补了国内对法国大革命研究的空白，引起了史学界对法国大革命政治文化研究的广泛的关注。但是，对于作为大革命政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公民教育，仍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不仅没有这方面的专著，涉及这方面的论文也非常之罕见。总之，对于大革命时期公民教育的课题仍是一个亟待开垦的前沿学术领域。

本书的宗旨在于，对大革命时期公民教育的课题展开试验性研究工作，在尽可能充分占有资料和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对法国大革命时期公民教育这一课题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初步的、较为全面的研究，以揭示公民教育与大革命自身的关系，阐明公民教育在大革命政治文化中和大革命进程中，乃至在

公民教育史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本书在绪论和前四章中，简要剖析了大革命时期关于公民、公民身份、公民意识和公民教育概念的内涵和分歧；回顾了法国旧制度“臣民教育”的状况及其对法国社会发展的阻碍；重点分析了启蒙运动时期新的教育思想的产生、启蒙教育理论对法国教育发展的推动，以及启蒙运动的国家主义教育理论和道德教育理论之间关于公民教育的分歧和对立；新的教育思想对旧制度下法国公民的职业技术教育的兴起起到了直接推动的作用。

本书的后六章着重分析了大革命时期公民教育理论产生的特殊社会背景、公民教育的内涵和公民教育的实践历程。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以最激进的方式进行的最伟大的革命之一，“民族再生”是革命家自命承担的伟大使命，而公民教育则是大革命实现“民族再生”伟大使命，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全方位的改造的最重要方式和手段。观念不同的教育理论在大革命中形成的互相对立、互相冲突、互相排斥的关系，导致了公民教育的实践与政治革命的进程一样激烈和激进。大革命公民教育的实践涵盖了社会政治文化和宗教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政治革命的性质赋予了公民教育以鲜明的政治特征，公民教育则将大革命的政治特征深深地烙在了法兰西民族的躯体之上；法兰西民族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著名的政治民族，大革命时期的公民教育所起的作用绝不可低估。

大革命公民教育的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实践，对西欧文明进程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它不仅是法国乃至整个西欧文化转型的重要标志，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推动了西方发达国家公民教育的兴起，使公民教育最终成为现代政治民主化的主要源泉之一。

笔者自知，对大革命公民教育的研究不仅是一个崭新的课

10 “民族再生”的期望：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民教育

题，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课题。公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构成了一项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内容涉及文科的哲学、法学、教育学、政治学、语言学、历史学，甚至还涉及理科和工科等诸多学科领域，对其进行研究也不亚于一项复杂的学术工程，实难以个人或少数学者的能力在某一学科内的艰辛努力来实现，亟须各门学科师长同仁共同努力，方可求得法国大革命公民教育的意义之真实。

目 录

引 言	(1)
绪 论 大革命时期公民教育的有关问题	(1)
一 公民和公民意识	(1)
二 大革命的两种公民教育概念	(10)
三 古典民主情怀对大革命公民教育的影响	(16)

上编 大革命公民教育的先声

第一章 旧制度法国的“臣民”教育	(34)
一 旧制度下的法国学校教育制度	(34)
二 旧制度下法国教育的社会后果	(49)
第二章 启蒙教育思想的兴起	(59)
一 启蒙运动与教育新思想的产生	(59)
二 启蒙教育思想的理论分歧	(71)
第三章 启蒙时代职业技术教育的传播和成就	(87)
一 法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开端与推进	(88)